

回到马克思的生产视角： 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比较分析

高岭 唐昱茵 胡天祺 邵岩*

摘要：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要求。稳步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本文通过比较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种经济学理论蕴含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发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几乎没有为探讨共同富裕留下空间，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卡莱茨基模型虽然为探讨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洞见，但其操作方案在本质上是分配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偏离了马克思强调的“生产视角”的优先性原则。以“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综合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真正回归马克思的生产视角的理论模型，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劳动过程；工资导向型增长

中图分类号：F0-0

一、引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图景中，“共同富裕”是一个核心要素，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①，“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共同富裕”确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并不断为之奋斗。毛泽东同志于1953年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③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共同富裕”理念的雏形。改革开放后，邓小

*高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gaoecon@xmu.edu.cn；唐昱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yytang20@fudan.edu.cn；胡天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市委办公厅，邮政编码：310020，电子信箱：swbhtz@hz.cn；邵岩（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2018000415@ruc.edu.cn。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演进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1YJC7900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有企业生产组织创新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72022103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①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7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0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69-570页。

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①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不平等扩大趋势(Piketty et al., 2019; 罗楚亮等, 2021), 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②

关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国家已经给出了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强调了生产发展因素, 也强调了再分配的作用。与之相适应, 理论界关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探讨也呈现出生产视角和分配视角两个面向。^③ 分配视角的文献基本是围绕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探讨调节收入差距的措施(李实, 2022; 李实、朱梦冰, 2022; 席恒、余澍, 2022)。如果撇开共同富裕这个特定的中国语境, 这个脉络的研究其实与更一般的中国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文献并无显著差别(Piketty et al., 2019; Zhang, 2021)。与分配视角不同, 生产视角的文献着眼于高质量发展, 强调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如果不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强, 只把蛋糕分来分去, 那么蛋糕就会越分越小, 最后不会共同富裕, 只会共同贫穷(厉以宁等, 2022)。在实现路径上, 现有文献从宏观层面立足于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 关注培育人力资本、推动国民共进、乡村振兴(董志勇、秦范, 2022), 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统筹增长和分配, 最终循序渐进地实现有合理差别的收入分配(厉以宁等, 2022)等等。总体上, 分配视角的文献较多, 生产视角的文献相对较少, 而且停留于宏大叙事。更为重要的是, 现有文献过度拔高了收入分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 忽视了生产方式是共同富裕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很早就正确地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 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 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 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 就形式说, 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④马克思的生产视角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强,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的理念是一致的。

坚持“生产领域是决定性因素”的理念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别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根本标志(法因、哈里斯, 1993)。本文尝试从比较视角研究供给导向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需求导向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综合了供给、需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理论价值。比较研究的难点在于共同富裕迄今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尚无明晰的定义, 但目前还是取得了部分共识。理论界普遍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面向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刘培林等, 2021), 至少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 社会整体达到富裕水平, 消除绝对贫困; 第二, 全体人民的富裕; 第

①邓小平, 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第110-111页。

②《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8月17日), 参见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③当然, 这并不是说分配视角的学者就忽视了生产或者生产视角的学者忽视了分配, 而是根据生产和分配在其论证中的相对重要性来划分的。

④马克思、恩格斯, 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第19页。

三,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富裕;第四,有差异的富裕,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合理(刘培林等,2021)。还有学者从长期的动态视角认识共同富裕,在经济层面,共同富裕不仅涉及同代人的收入分配,还涉及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贫富悬殊导致的阶层流动性不足,会严重打击低收入群体及其后代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体经济循环陷入低效率均衡。因此,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这种低效率均衡,形成多数人群达到中等富裕水平的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阶层流动畅通的社会结构(厉以宁等,2022)。

本文从劳资分配的角度把共同富裕界定为劳资双赢,即扭转工资份额持续下降,工资总额与利润总额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协同增长。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涉及的是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则是同代人的收入分配,似乎不能从中比较和评估三种理论范式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理论价值。但是,如果注意到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是同代人的收入分配累积和传递的结果,就会发现同代人的收入分配是基础性的。而且,本文不以收入分配的形式(同代还是代际)作为评估的标准,而是以该理论模型能够为分析“增长与分配”留下多大的空间,也即理论张力为准绳。因此,本文认为三大理论范式之间是可以比较的。基于这个前提,本文评述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上的理论洞见和局限。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从生产视角弥补了当前从分配视角研究共同富裕的不足,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操作方案。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分析,第三部分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分析,第四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分析,第五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最后是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纵观经济思想史,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提出的理论学说在“长期经济增长是任何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在于长期增长的实现路径。本文的目标旨在从宏观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中找到可以“兼容”共同富裕的理论版本,从而为经济发展评估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价值。严格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难以为共同富裕提供恰当的理论基础。但是,鉴于其在理论界的影响力,本文尝试挖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潜在的能用于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空间。

索洛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逻辑起点。在索洛模型中,如果有效劳均资本存量高于黄金律水平,那么通过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降低全社会储蓄率,使得持平投资状态下的有效劳均资本存量达到黄金律水平,则会增进全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在长期中还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资本折旧率不变的情况下(Solow, 1956)。索洛模型虽然不够精致,但正是其将储蓄率进行外生处理的假定为共同富裕的实现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但更精致的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对储蓄率的内生化处理反而彻底消除了这种理论可能性。

具体来说,拉姆齐模型保留了索洛模型的核心假设,但是在模型中增加了家庭这一经济

主体,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竞争性厂商通过租赁资本和雇用劳动来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家庭成员“长生不老”且家庭数量固定不变;家庭提供劳动、持有资本并进行消费和储蓄,资本无折旧。所有家庭成员的效用函数都采用 CRRA 效用函数形式,并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济决策。正是因为有了家庭这一微观基础,储蓄率才得以内生:家庭在约束条件下,在无限期的时间中追求动态最优——也即在无限期时间中实现效用最大化。在给定终生消费不得超过终生收入的截断条件下,经济会向稳态收敛,从而达到最优状态。在这样的经济中,显然不存在收入两极分化的情况,因为所有家庭是同质的,会做出整齐划一的决策,并且还是一切要素的所有者。在给定贴现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以及个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情况下,稳态是唯一的。在外生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经济体因任何外生因素偏离稳态或者鞍点路径都只是暂时的,经济最终总会回到鞍点路径上,然后,收敛到稳态。

因此,标准的拉姆齐模型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经济,从而无法直接为现实经济提供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为了增强拉姆齐模型的应用性,有些学者试图通过放松基准模型的假设,使模型能够刻画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第一,通过在拉姆齐模型中引入家庭最低消费水平,研究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与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时间(Alvarez-Pelaez and Díaz, 2005);第二,通过考虑参数的异质性来扩展模型,以刻画不平等的形成机制(Benhbib et al., 2011; Kaymak and Poschke, 2016)。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更多是借助于外生冲击来研究分配不均的形成过程。

与拉姆齐模型不同,在标准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简称 OLG 模型)中,存在通过再分配手段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需要满足严格的限定条件,而且,这种再分配仅仅是代际间分配,这意味着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并不能带来任何福利改进。作为对模型的拓展,有些学者通过将人力资本投资内生,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存在信贷约束条件下,财富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Galor and Zeira, 1993; Chakraborty and Das, 2005)。这些研究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财富不平等会降低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在世代交叠模型刻画的经济图景中,似乎只要政府能纠正信贷市场中的市场失灵,特别是针对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上的市场失灵,就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这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财富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只是暗示政府干预有可能减轻财富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而且,世代交叠模型回避了总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这其实是所有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共同缺陷。

新古典增长模型信奉的是萨伊定律,强调供给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仅仅将(有效)需求视作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忽视了总需求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在长期中并不必然会收敛于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水平,萨伊定律是否成立是值得怀疑的(Petri, 2003)。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但仍不宜将其作为理解共同富裕的基准模型。

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作为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之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卡莱茨基模型沿袭了凯恩斯传统,重视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因为不同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收入分配会对有效需求产生结构上和总量上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作为一个基准模型,新卡莱茨基模型无疑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 注重劳资收入分配

在新卡莱茨基模型中,产能利用率是可变的,资本家会根据产能利用率做出投资决策;在产能利用率没有达到最大值时,产品的边际成本是不变的;产品价格以直接成本加成的形式体现,加成的大小取决于市场势力(Lavoie, 1995)。

在早期的新卡莱茨基模型中,由于劳动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工资份额的提高将导致经济中的储蓄率下降、消费品需求提升,从而使企业产生更高的产能利用率预期。在更高的产能利用率预期的驱使下,企业将提高积累率,从而最终提升经济的产能利用率和积累率(拉沃,2009)。这一“节俭悖论”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无疑是可喜的:只要简单地利用政策工具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既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马格林和索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73—1975年爆发的结构性危机的研究发现,在OECD国家,远在石油价格震荡之前,就出现了普遍的“由充分就业造成的利润挤压”。这个现象并不是与经济周期相联系的(经济周期涉及的只是短短几年的波动),而是长期持续增长、工资上升、充分就业、劳动人民经济安全性提高的结果(Marglin and Schor, 1990)。因此,工人工资份额的提高并不必然就会促进经济增长。早期的新卡莱茨基模型之所以不存在工资份额上升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形,是因为在其设定的投资函数中,产能利用率是唯一的自变量。工资份额的提高必然会带来更高的产能利用率,从而引致更高的积累率。但是,积累率并不是只受到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还会受到利润率的正向影响——如果利润率过低,那么即便企业所预期的产能利用率再高也无法刺激企业追加投资,实际产能利用率也不会提升。

作为模型的改进,巴杜里和马格林于1990年对投资函数的设定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一个更全面的新卡莱茨基模型——巴杜里-马格林模型(Bhaduri-Marglin Model)。在该模型中,投资既是产能利用率的增函数,也是利润份额的增函数(Bhaduri and Marglin, 1990)。这种处理将利润率纳入投资函数中:在潜在产出和资本存量之比可以被合理地假定为不变的情况下,产能利用率和利润份额的变动能够反映利润率的变动特征。在新的设定下,假定封闭经济中储蓄比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变化更为敏感,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命题:(1)当储蓄比投资对利润份额变化更为敏感时,封闭经济是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提高工资份额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提高;(2)当投资比储蓄对利润份额变化更为敏感时,封闭经济是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只有提高利润份额才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如果把模型从封闭经济拓展到开放经济中,结论会有所不同。在开放经济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如果储蓄比投资对利润份额变化更敏感,经济体是否还是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并不确定。这是因为虽然提高工资份额会提升国内产能利用率,但由于价格加成只受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因而保持不变,这样的话,工资份额提高必然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而这对产品出口会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对国内产能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简言之,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开放经济条件中,经济体即使是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工资份额提高对国内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相比封闭经济状态下也会更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巴杜里-马格林模型预示了一个悲观的情形。首先,经济体仍然有转向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的可能;其次,即便经济体是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劳资合作也有可能实现——更何况马歇尔-勒纳条件不一定能够成立(Rose, 1991)。事实上,无论是工资导向型经济还是利润导向型经济,劳资都有合作的可能性。在工资导向型经济中,提高产能利用率虽然需要降低利润份额,但只要产能利用率

提升的幅度足够大,大到利润份额下降带来的利润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被完全抵消,甚至使得利润总量提高,就存在劳资合作的可能。同样的,在利润导向型经济中,如果提高利润份额对产能利用率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使工资总量不变或增加,那么,劳资同样有合作的可能。

从现实条件看,不论是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还是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劳资合作的实现难度都很大。第一,虽然存在劳资合作的可能,但利润导向型的发展道路并不符合“共同富裕”要求消除两极分化的基本要求。第二,劳资合作虽然有“可能”,但实现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工资导向型经济中,即便满足劳资合作条件,提高工资份额从而在短期中对总利润造成挤压可能会加剧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Bhaduri and Marglin, 1990)。在考虑企业间劳动生产率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工资份额提高可能会使一些企业损失严重甚至停产,而另一些企业则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利润导向型经济中,即便满足劳资合作条件,利润份额的提高带来的就业增长可能是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人”的工资率来实现的——但“内部人”显然更希望新增的工资总额能全部用于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因此,“内部人”和“外部人”显然存在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很可能被管理者转化为对工人进行“分而治之”的工具(Bhaduri and Marglin, 1990)。因此,即便不考虑劳资协调谈判的困难,劳方和资方的内部协调问题也非常棘手。

基于上述论述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制定相关再分配政策的起点,是明确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究竟是“利润导向型”还是“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巴杜里-马格林模型在1990年提出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掀起了对增长体制类型识别的实证热潮相比,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单薄。刘盾(2020)认为中国已经转换为“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邹薇和袁飞兰(2018)认为中国正在从“利润导向型”转向“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赵峰等(2018)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国内需求为“工资导向型”,但总需求为“利润导向型”。这些经验研究的理论基础都是巴杜里-马格林模型,但并没有取得共识。如果仔细审视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它们普遍存在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忽视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忽视劳动者之间的异质性很可能会降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因而值得着重讨论。

(二)调节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配

在现有研究中,很多基于新卡莱茨基模型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选择性地忽视了“间接劳动”。“间接劳动”是指企业的管理人员、监督人员和维修人员的劳动总和。忽视间接劳动会从两个方面导致对经济增长体制类型的误判:(1)未控制间接劳动的周期性波动使得相关参数估计有偏;(2)低估劳动者的储蓄率(Lavoie, 2017)。

Sherman 和 Evans(1984)对间接劳动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做了经典的阐释:在扩张期的多数时间中,工资份额下降主要是由生产率提高所驱动的,而且,主要是间接劳动占有所有劳动的比例下降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生产率在上升,但实际工资在扩张初期上升的速度并不快。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是:资本家会自动占有增加的产品,而工人必须通过谈判和其他劳资冲突的手段才能提高收入。在接近扩张的周期性高峰时,生产率此时已然平稳或是已经在下降,而高就业水平带来的劳动者高议价能力使得实际工资保持上涨,最终是工资份额会略有上升;而在收缩期的多数时间中,工资份额上升主要是生产率下降导致的间接劳动占有所有劳动比例上升所造成的结果。最后,在收缩期结束时,高失业率导致劳工议价能力下降,于是,工资份额又开始下降。

对于存在间接劳动的经济体,即使在基于直接劳动成本的加价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

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也会导致利润份额增加。因此,除非对间接劳动进行控制,否则经验研究很容易得出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的结论。此外,在间接劳动中,管理人员的收入,特别是高管的收入,一旦被划入劳动份额中,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管理人员的储蓄率相比普通员工较高,并且其相对收入份额一直在上升。如果工资份额的提高更偏向于提高管理人员的收入,那么工资份额增加所带来的总需求扩张效应就会下滑,这会导致在经验研究中误判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为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Palley, 2017)。因此,在研究设计中,如果不考虑间接劳动会造成误判,更不用说不考虑间接劳动的周期性波动的情况。已有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人员收入份额一直上升,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和企业的利润份额一直在缩小,那么在实证上更容易得出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的结论。只要普通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管理人员,增加直接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就会改善经济状况(Palley, 2017)。

综上所述,若要从经验证据上识别增长体制类型,在理论上和变量选取上区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收入,或是区分普通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收入份额是极为必要的。而且,不能低估识别增长体制类型的困难。一旦放松新卡莱茨基模型的某些假定,增长体制类型的识别会变得极为复杂,而且经常是内生的。黄彪和赵晓楷(2021)认为,在生产部门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经济体在总量层面的增长体制类型通常难以确定。如果将收入分配内生,考虑收入分配会受到有效需求的影响,经济总量和部门层面的增长体制就同样难以确定。此外,当经济体存在多种生产技术时,收入分配变动会引起增长体制转轨和再转轨。因此,新卡莱茨基模型中的体制类型并不存在。相反,我们认为,将经济结构引入新卡莱茨基模型无疑是一种进步,并且能够以更接近现实的情形反映“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是研究者放弃将新卡莱茨基模型作为基准模型的充分理由,理论上的复杂性恰恰是分析复杂经济情况的有力工具。

Nikiforos 和 Foley(2012)的研究间接支持了我们对新卡莱茨基模型应用价值的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增长体制类型会随着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如果经济体处于较低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就很可能属于工资导向型;如果经济体处于较高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就很可能属于利润导向型。这一结论破除了单一增长体制的论断,强调经济体可以在不同增长体制间转换。此外,他们还对增长体制类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定义:只要工资份额增加能提高均衡产能利用率,就是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而只要工资份额下降能带来均衡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就是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这个定义实际上规避了黄彪和赵晓楷(2021)的质疑,为相关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对我国来说,就是首先需要确定我国增长体制转换的临界条件,然后基于临界条件确定当前经济的增长体制类型,从而确定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即使采用完备的统计和计量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体制进行细致的实证检验,得到了“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的结论,这也不意味着我国共同富裕实现的可能性消失了。需求驱动的增长体制类型并不是外生的,它由不同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加成率、生产技术选择和劳动者内部收入分配情况所决定。因此,充分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以构建工资导向的需求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可能的。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了突出有效需求的作用,对总供给做了较为严苛的假定。在新卡莱茨基模型中,当经济中的产能利用率未达到最大值时,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假定不变的。

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产能利用率在达到峰值之前,有效需求扩张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个假设回避了供给对于有效需求的限制作用,不能解释一旦在长期经济达到最大产能利用率后,有效需求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做法是引入内生性技术进步,通过考虑有效需求扩张对供给水平的促进作用来使最大产能利用率内生,使产能利用率不再是一个在长期中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内生性技术进步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条路径:(1)马克思-韦伯效应;(2)卡尔多-维尔顿效应(Lavoie, 2017)。假设工资份额增加会提高实际工资率,则当经济体为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时,工资份额增加带来的实际工资率提高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同时,工资份额增加带来的有效需求的扩张又会进一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前者即马克思-韦伯效应,后者即卡尔多-维尔顿效应。如果经济体为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马克思-韦伯效应和卡尔多-维尔顿效应则是冲突的,即劳动生产率可能会由实际工资率的提高驱动,也可能会由实际工资率的下降驱动。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两种效应能否成立是存疑的。

首先,实际工资率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尽管有一系列实证研究支持这种关系存在,但实际工资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实是复杂的(Stockhammer and Onaran, 2013)。实际工资率的升高无疑会促使劳动者提供更多有效劳动(Bowles, 1985; Shapiro and Stiglitz, 1984),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实际工资率的提高还会带来总需求的扩张,这意味着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总需求增速,经济体就会达到更高的均衡就业水平。而更高的就业水平会增强工人的议价能力,这会使得工人在给定工资水平下提供的有效劳动下降,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Bowles, 1985; Shapiro and Stiglitz, 1984)。因此,实际工资率上涨对劳动生产率的最终影响是不确定的。对这一点的忽视,也反映了新卡莱茨基模型的一个缺陷——几乎没有考虑与总供给水平紧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

其次,相关实证研究所支持的“实际工资率提高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实际工资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总需求增速,那么就业水平可能是“利润导向型”。如果这一点成立,即使在工资导向型经济中,卡尔多-维尔顿效应也与马克思-韦伯效应冲突。Basu 和 Budhiraja(2021)的研究则进一步否定了许多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卡尔多-维尔顿系数(也称KV系数)无法真实反映卡尔多-维尔顿效应,而实证上通用的方法就是用卡尔多-维尔顿系数来判定卡尔多-维尔顿效应是否存在。

因此,新卡莱茨基主义者试图将技术内生以回避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的努力是失败的。本文认为,新卡莱茨基模型的发展需要以巴杜里-马格林模型为基础,将充满不完全契约性质的劳动力市场纳入理论框架中,从而形成一个更完备的、相对于新古典的替代性增长理论。此外,新卡莱茨基模型过度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视了马克思强调的收入分配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有回到生产视角,以生产过程为起点构建有效需求导向的增长理论才是一个完备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性增长理论。事实上,以Bowles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虽然马克思很早就揭示了“资本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但直到Bowles正式提出“劳动榨取模型”,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的形式化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高岭等, 2022)。在劳动榨取模型中,假设资本家和工人分别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资本家可以采用三种手段“榨取”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1)提高工资水平,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可以提高工人失业的机会成本;(2)提高监管力度,更高的监

管力度会提高工人偷懒被发现的概率;(3)分化工人,降低工人团结程度会提高工人偷懒被发现的概率。这三种措施都会通过影响工人的效用水平从而促使其选择更高的实际劳动投入。基于劳动榨取模型,“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存在”、“生产关系对最优技术选择的阻碍”、“工人内部无关实际贡献的收入分化”以及“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等宏观现象就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Bowles,1985)。

同样的,虽然马克思揭示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但直到 Bowles 和 Boyer(1988)提出“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蕴含的“劳动过程-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才得以正式化和模型化。“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刻画的是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的封闭经济,雇员根据工资选择消费水平,雇主根据利润选择投资水平,政府根据失业水平发放失业救济金——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总需求。一方面,收入分配会影响储蓄和投资,从而成为总需求的关键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又是关于劳动强度和工作薪酬的阶级冲突的结果。其中,阶级力量的均衡位置取决于就业水平,从而最终取决于总需求水平。政府的救济金发放水平不仅会通过影响工人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对私人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而且会直接影响总需求水平(Bowles and Boyer,1988)。

在 Gintis 和 Bowles 看来,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增长趋势是理解福利国家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张力的关键,而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遗漏了马克思强调的“劳动强度(劳动榨取)”在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Gintis and Bowles,198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学派和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传统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及其消亡。Bowles 正是要弥合供给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和需求导向的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传统之间的缝隙,通过劳动榨取函数将二者综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中,工资具有三重作用:消费需求的来源、单位劳动成本的组成部分(对利润的扣除)和作为资本规训(discipline)劳动的工具(Bowles and Boyer,1988)。根据工资率与就业之间的变动关系,可以识别经济体的增长体制。工资率变动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水平的反向变动,二者还存在同向变动的可能。如果工资率和就业同方向变动,工资率提高伴随就业增加,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就被称为工资导向型(Wage-led)增长体制。相反,如果工资率和就业反方向变动,工资率提高导致了就业减少,这种状态下的经济则被称为利润导向型(Profit-led)增长体制。

在“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中,工资率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超额需求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就业水平。因此,超额需求对工资的导数和就业水平对超额需求的导数共同决定着经济体究竟处于工资导向型还是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就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来说,工资率与就业之间的正向变动关系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第一,超额需求对工资的导数为正值,且超额需求对就业水平的导数为负值。这意味着工资上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投资的抑制效应,从而产生了超额需求。当就业增加以抵消超额需求时,市场出清。这种情况下的就业体制被称为消费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第二,超额需求对工资的导数为负值,且超额需求对就业水平的导数为正值。这意味着工资上涨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大于其对消费的促进效应,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但由于工人并没有利用就业增加带来的工资议价权而索取过高的工资,从而没有发生利润挤压,企业仍会选择扩大投资,最终,实现了“工资增加、就业增加”的市场均衡。这种情况下的就业体制被称为投资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由于工资和就业的协同增长是通过组织化的集体工资机制实现的,也

叫集体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不论是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没有出现显著的利润挤压问题。特别是在投资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中,具有鲜明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非零和博弈特征,即为了保障投资,他们之间会就工资约束达成协议(Bowles and Boyer,1988)。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过程的组织是以劳资合作为核心,资本(机器)与工人技能兼容的形式进行的。劳动纪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胡萝卜”——工资待遇的激励作用,而不是“大棒”——监督和失业威胁。这是因为资本家清醒地知道在劳动过程中,特别是需要高知识技能或重大质量考虑的劳动过程中,过度的监督并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工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多一些胡萝卜,少一些大棒”的劳动纪律策略会给企业带来效率改进。

“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承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为起点的分析传统,这就为新卡莱茨基模型所忽视的“间接劳动”提供了理论解释空间。在生产视角下,企业是围绕劳动榨取而形成的层级组织,企业的生产活动通过一个权威结构来协调。由于劳动契约的不完全性质,要实现劳动榨取就必须依赖间接劳动对直接劳动进行监督管理。在劳动榨取模型和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中,支付给间接劳动的报酬作为监督费用直接作为关键变量进入了模型设定。因此,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在模型中被清晰地区分开来了。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从“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出发所界定的“工资导向型”和“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实际是排除了 Sherman 和 Evans(1984)所提及的间接劳动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此外,在模型的设定中,企业内每个直接劳动者被抓到怠工的概率是与企业内总的间接劳动投入正相关的——这就捕捉了企业的间接劳动数量相对固定的典型事实(Bartelsman et al.,2013)。因此,“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完全能捕捉间接劳动占有所有劳动的比例随经济周期而涨落这一现象。为了进一步说明间接劳动(马克思说的非生产性劳动)在帮助资本榨取生产性劳动中的作用,Jayadev 和 Bowles(2006)还提出了护卫劳动(Guarding Labor)理论,监督工人是护卫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监督工人有多种。但在“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中,Bowles 是把监督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从而只能考察监督工人整体和生产工人整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考虑了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是没有问题的。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体制问题上,Bowles 的“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与新卡莱茨基模型殊途同归。但是,在分析方法上,生产视角的“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比分配视角的新卡莱茨基模型更科学。遗憾的是,迄今很多经济增长体制类型的研究都是围绕新卡莱茨基模型展开,而对 Bowles 的“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的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都很少。如果今后能把“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中的生产工人拓展为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研究不同工人类型的劳动纪律策略及其相适应的就业体制,则不仅能够考察监督工人与生产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异,而且能够探讨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异。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Bowles 的研究已经表明,在资本雇佣劳动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是劳动纪律发挥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逻辑就已经可以确定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更不用说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逻辑,即资本家俘获国家出台对资本有利的政策(Jayadev and Bowles,2006)。正因为如此,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在资本主义

国家注定是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比如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长期的利润导向型增长体制留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是工资份额与利润份额的不断分化,这一点已经在皮凯蒂的研究中得到证实(Piketty,2014)。由于增长体制转换的困难和制度约束,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再分配缓解贫富差距是很多国家想做就能做的事情,而通过生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中国就具备这个条件,生产发展导向的中国共同富裕道路才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特色。

接下来,本文通过将 Bowles 的“劳动纪律-总需求”理论同马克思的生产与分配关系原理进行整合,提炼一个“生产组织方式-劳动纪律-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的实现路径。

自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方式陷入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活动乃至宏观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制于总需求不足。以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使供给系统能够及时响应市场需求的产物。具体到我国,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2年进入新常态以来,日益突出。面对我国标准化需求与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只能立足我国本土需求的特殊性,综合大规模生产方式和大规模定制方式的特征,构建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从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看,可行的方案是在企业之间构建弹性生产网络(谢富胜等,2019)。因此,直面我国需求结构的特殊性,通过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重塑劳动纪律,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弹性生产网络,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劳资双赢的分配格局,是我国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组织理论,生产活动总是在特定的生产组织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①对应特定的劳动纪律,劳动纪律的类型(“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内生出资劳关系的异质性:劳资对抗和劳资合作。劳资关系的异质性又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异质性:利润导向型增长和工资导向型增长(骆桢、张衍,2018)。作为生产发展的结果,经济增长方式的异质性决定了劳资之间初次分配的异质性:“零和关系”和“正和关系”(拉佐尼克,2007;孟捷,2011)。本文尝试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切入点,提供一个操作方案。

第一,国有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与消费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自2012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大规模生产方式与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化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出路是变革我国大规模生产方式主导的供给系统(谢富胜等,2019),这要求国有企业对现有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行变革,从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向大规模定制方式。目前,国有企业普遍采用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大规模生产方式。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可以低成本地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但标准化产品已不能满足我国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生产方式追求的是操作效率,以降低成本为代价获取竞争优势。如果由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向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从追求操作效率转向过程效率,企业就需要团结和激励劳工,通过集体学习和组织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简言之,

^①这里的生产组织方式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界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或技术和包括劳动分工在内的组织形态是如何结合的,即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谢富胜,2005;宋磊,2020)。

以“胡萝卜”(工资待遇)为主的劳动纪律代替了以“大棒”(监督和失业威胁)为主的劳动纪律,这样的合作型劳资关系有利于促成“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骆桢、张衔,2018)。根据劳动纪律-总需求理论,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的实现路径包括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两种。国有企业的制度条件比较容易促成消费驱动机制,即工资上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投资的抑制效应,从而确保工资和就业同方向变动。伴随消费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中的工资份额增加。这种增加并不意味着利润份额绝对减少,而是指“工资与利润”协同增长的一种情况。因此,如果国有企业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为大规模定制方式,通过合作型劳资关系走向“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就有可能在国有企业内部实现劳资分配的“正和关系”。

第二,重塑民营企业的劳动纪律与投资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受总需求的动态多样性约束,我国供给体系需要构建由负责集成创新的国有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的民营企业组成的国内生产网络。在生产网络中,国有企业负责关键部件创新,这是由国有企业在我国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创新能力的独特性决定的(叶静怡等,2019;Lo et al.,2022)。假设国有企业能够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转型为消费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那么我国劳资分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民营企业。对于负责模块化生产的民营企业,其生产组织方式仍然是依赖压低工资谋取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纪律是以“大棒”(监督和失业威胁等)为主,“胡萝卜”(工资和奖金等)的作用较小。有没有可能在维持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变革民营企业的劳动纪律?对于生产网络中的民营企业是可能的。因此,(1)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软性”的制度示范效应,引导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由股东至上模式转向利益相关者模式,向民营企业传播合作型劳资关系模式,引导其走向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2)国有企业在生产网络和产业链中处于有利位置,掌握着关键资源,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参与民营企业治理,规范其用工制度和劳动过程中的劳动纪律。这样,在国有企业参与治理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劳动纪律就可能扩大“胡萝卜”的力度。不过,如果出现了工资上涨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大于其对消费的促进效应情况,一定要确保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即没有出现利润挤压,这时,民营企业才会继续扩大投资。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可能迈上投资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方式。

第三,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导向的共同富裕道路的世界意义。从经济发展史看,不同国家在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决定的。生产组织方式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市场控制和组织控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控制型生产组织方式在世界范围成为主流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之相适应的是以“大棒”(监督和失业威胁)为主的劳动纪律支配了劳动过程。一旦这种生产组织方式成为占主导的宏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初次分配的利润份额增加和工资份额下降,缩小贫富差距只能寄希望于收入再分配。事实上,如果把视野转向与市场控制型生产组织方式不同的组织控制方式,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图景。组织控制型生产组织方式旨在通过劳资合作寻求生产率进步和竞争优势,因此,在生产过程和初次分配中就抑制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国有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选择。更重要的是,后发国家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作用,凭借生产组织形态创新是完全可能超越先进国家的(宋磊,2020)。因此,回归组织控制导向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选择。

六、结论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本文通过比较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发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几乎没有为探讨共同富裕留下空间,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卡莱茨基模型虽然为探讨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和洞见,但其本质上是从分配视角研究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因而偏离了马克思强调的“生产视角”的优先性原则。以“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综合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提供了不同于新卡莱茨基模型的增长体制转换理论。从生产视角研究收入分配的“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回到了马克思的生产视角。本文认为它是当前最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参考价值的理论学说。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生产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要警惕拉美国家历史上由“福利赶超”导致的财政危机、经济波动和增长停滞等后遗症。这启示我们,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回到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线上。本文将马克思的生产与分配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组织方式-劳资关系-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并以国有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为突破口,提出了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实现路径,即塑造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是一种高端路径,即通过劳资合作和利润分享来激励工人,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维持竞争优势。高端路径比低端路径能持续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当前已经具备走工资导向型的高端路径发展模式的某些微观基础(高岭等,2020)。因此,今后我们应当注重继续完善满足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要求的制度安排,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增长-分配”理论传统。“在增长中促进收入分配相对均等化”的政策,其实也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经济增长被假定为一个中性目标,一旦增长引擎被启动,其涓滴和扩散几乎是自动的,穷人将从整体经济增长中受益。然而,理论上的“涓滴”效应很少在现实中发生(盖凯程、周永昇,2020)。作为替代性分析框架,在本文提出的“增长-普惠”分析框架中,经济平等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变革生产组织方式的条件下发生的。本文认为生产组织方式对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起关键作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很多国家都试图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但最终由于财政不可持续而“拆散福利国家”,或者以高额税收勉强支撑。相比再分配,通过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是一条艰难而效果持久的道路,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本文认为,中国具备这个条件,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导向的中国共同富裕道路才具有世界特色。而且,再分配只能在短期中缓解贫富差距,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则能够在长期中较为彻底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参考文献:

1. 本·法因、劳伦斯·哈里斯,1993:《重读〈资本论〉》,中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
2. 董志勇、秦范,2022:《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和实践路径探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3. 盖凯程、周永昇,2020:《所有制、涓滴效应与共享发展: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4. 高岭、余吉双、杜巨澜,2020:《雇员薪酬溢价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经济评论》第6期。

- 5.高岭、翟润卓、唐昱茵,2022:《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第7期。
- 6.黄彪、赵晓楷,2021:《体制存在吗?——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批判》,《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 7.李实,2022:《以收入分配制度创新推进共同富裕》,《经济评论》第1期。
- 8.李实、朱梦冰,2022:《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第1期。
- 9.厉以宁、黄奇帆、刘世锦、蔡昉,2022:《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中信出版社。
- 10.刘盾,2020:《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利润拉动”还是“工资拉动”?——再测功能性收入分配对我国需求增长与结构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 11.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2021:《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第8期。
- 12.罗楚亮、李实、岳希明,2021:《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13.骆桢、张衔,2018:《劳资关系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第6期。
- 14.马克·拉沃,2009:《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山东大学出版社。
- 15.孟捷,2011:《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经济研究》第4期。
- 16.宋磊,2020:《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开放时代》第6期。
- 17.威廉·拉佐尼克,2007:《车间的竞争优势》,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8.席恒、余澍,2022:《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19.谢富胜,200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
- 20.谢富胜、高岭、谢佩瑜,2019:《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11期。
- 21.叶静怡、林佳、张鹏飞、曹思未,2019:《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作用: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经济研究》第6期。
- 22.赵峰、陈宝林、章永辉、季雷,2018:《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0期。
- 23.邹薇、袁飞兰,2018:《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 24.Alvarez-Pelaez, Maria J., and Antonia Díaz. 2005. “Minimum Consumption and Transitional Dynamics in Wealth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 (3): 633-667.
- 25.Basu, D., and M. Budhiraja. 2021. “What to Make of the Kaldor-Verdoorn Law?”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5(6): 1243-1268.
- 26.Bartelsman, E., J. Haltiwanger, and S. Scarpetta. 2013.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Allocation and Sele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 305-334.
- 27.Benhbib, J., A. Bisin, and S. Zhu. 2011.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Fiscal Policy in Economies with Finitely Lived Agents.” *Econometrica* 79(1): 123-157.
- 28.Bhaduri, A., and S. Marglin. 1990.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4): 375-393.
- 29.Bowles, S. 1985.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 16-36.
- 30.Bowles, S., and R. Boyer. 1988. “Labor Discipline and Aggregate Demand: A Macroeconomic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2): 395-400.
- 31.Chakraborty, S., and M. Das. 2005. “Mortality, Human Capital and Persistent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0(2): 159-192.
- 32.Galor, O., and J. Zeira. 1993.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1): 35-52.
- 33.Gintis, H., and S. Bowles. 1982. “The Welfare State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Marxian, Neoclassical, and Keynesian Approach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2): 341-345.
- 34.Jayadev, A. and S. Bowles.2006. “Guard Lab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9(2): 328-348.
- 35.Kaymak, B., and M. Poschke. 2016. “The Evolution of Wealth Inequality over Half a Century: The Role of Taxes, Transfers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77: 1-25.
- 36.Lavoie, M. 1995. “The Kaleckian Model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nd Its Neo-Ricardian and Neo-Marxian Critiqu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 789-818.
- 37.Lavoie, M. 2017.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Debate on Wage-Led and Profit-Led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14(2): 200-221.
- 38.Lo, Dic, Ling Gao, and Yuchen Lin. 2022. “State Ownership and Innovations: Lessons from the Mixed-

- Ownership Reforms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0:302-314.
39. Marglin, S., and J. B. Schor. 1990.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40. Nikiforos, M., and D. K. Foley. 2012. "Distribu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Metroeconomica* 63(1): 200-229.
41. Palley, T. I. 2017. "Wage-vs. Profit-led Growth: The Rol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in Determining Regime Characte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1(1): 49-61.
42. Petri, F. 2003. "Should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Be Based on Say's Law and the Full Employment of Resourc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 'Class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N. Salvadori, 139-160. Cheltenham,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43.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4. Piketty, T., L. Yang, and G. Zucman. 2019.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7): 2469-2496.
45. Rose, A.K. 1991.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s in a Popular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oes the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Ho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0(3-4): 301-316.
46. Shapiro, C., and J. E. Stiglitz.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3): 433-444.
47. Sherman, H. J., and G. R. Evans. 1984. *Macroeconomics: Keynesian, Monetarist and Marxist Views*. New York: Harper & Row.
48.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49. Stockhammer, E., and O. Onaran. 2013. "Wage-Led Growth: Theory, Evidence, Policy."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1(1): 61-78.
50. Zhang, J. 2021. "A Survey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9(4): 1191-1239.

Back to Marx's Productio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owards Theorie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Gao Ling¹, Tang Yuyin², Hu Tianzhen³ and Shao Yan⁴

(1: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4: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bo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eady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undoubtedly requires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economic theories. By comparing the path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ree economic theori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finds that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 leaves little room for explor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at although the Neo-Kaleckian growth mode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provides insight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provided by it in essence is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ion,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emphasized by Marx. The Marxist growth model represented by the labor discipline-aggregate demand model, which integrates Marx's theory of the labor process and Keynes' theory of effective demand, is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truly backs to Marx's production perspective. We argue this model c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 to explore how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a wage-led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r Process, Wage-led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B51, E24, O40